

## 低生育率背景下农村青年生育观念的嬗变逻辑

陈继周慧

(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文章采用质性方法探究低生育率背景下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嬗变历程及其行动逻辑,着重关注生育政策收紧时“逃着生”诸种表征演绎为生育政策回归家庭与个体时“不想生”现象的直接分类,从而呈现生育观念在行动层面的直接外放。通过深度挖掘其嬗变历程及其演绎逻辑,则显现为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张力以及家庭主义与新家庭主义相抵牾。也即当家庭主义占据主流以及社会对性别关注度较高时,则为“逃着生”基本样态;而当个体主义占据优势以及社会对性别关注度较低时,则为“不想生”基本样态。据此可见,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嬗变要素凸显青年群体内在独特性,实存于从家庭主义到个体主义以及从家庭主义到新家庭主义转变中,且进一步表达为其对流变社会以及外来文化的内化与外显。

**关键词:**低生育率;个体主义;新家庭主义;生育意愿;农村青年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5-0102-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51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 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2 071万人<sup>[1]</sup>。回溯可见,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16年的13.57‰下降到2022年的6.77‰;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从2016年的6.53‰下降到2022年的-0.60‰(表1)。另据2021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sup>[2]</sup>,显著低于理想状态下人口生育率2的更替水平。因此,为解决生育率迅速下降问题,政府层面已经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各地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配套措施。学术界据此展开热烈讨论,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上述政策措施或学界建议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人口出生率仍呈下滑趋势。既往生育政策收紧时农村青年“逃着生”逐渐演变为时下生育政策回归家庭与个人之后“不想生”的现象。为什么会呈现这种现象?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行动调整与观念变迁?本文力图予以回答。

表1 2013—2022年人口统计表

| 指标         | 2022年 | 2021年 | 2020年 | 2019年 | 2018年 | 2017年 | 2016年 | 2015年 | 2014年 | 2013年 |
|------------|-------|-------|-------|-------|-------|-------|-------|-------|-------|-------|
| 人口出生率(‰)   | 6.77  | 7.52  | 8.52  | 10.41 | 10.86 | 12.64 | 13.57 | 11.99 | 13.83 | 13.03 |
| 人口死亡率(‰)   | 7.37  | 7.18  | 7.07  | 7.09  | 7.08  | 7.06  | 7.04  | 7.07  | 7.12  | 7.13  |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0.60 | 0.34  | 1.45  | 3.32  | 3.78  | 5.58  | 6.53  | 4.93  | 6.71  | 5.90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收稿日期:**2024-09-10

**作者简介:**陈继,男,社会学博士,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区建设与发展。

**基金项目:**安徽工程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产业项目进村中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实践行为分析”(2023YQQ014);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城乡融合背景下返乡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及其实现机制研究”(2023AH050889)。

##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维度

### (一) 文献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鼓励增长、放任增长、严格控制增长<sup>[3]</sup>到逐渐放开几个阶段,即从鼓励生育、节制生育到后来“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再到20世纪80年代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直至发展到“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等<sup>[4]</sup>。期间,学者们对政策内涵、实施效果、存在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形成该项政策实施以来的基本判断。

#### 1. 生育成本论

生育由诸多成本构成,如生育成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婚姻成本等,进而让青年群体面对“想生而又不敢生”<sup>[5]</sup>的尴尬境地。国外学者贝克尔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探讨欧洲家庭生育决策,认为家庭是基于“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原则作出理性生育决策<sup>[6]141-162</sup>。国内学者从家庭经济学视角分析人们的生育行为,例如,李建民基于中国生育率转变历程,指出现代社会生育率下降已进入“生育成本约束驱动阶段”<sup>[7]</sup>。郑真真等从育龄妇女角度分析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指出当“生育的精神需求”成为生育重要理由时,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将越来越低<sup>[8]</sup>。对家庭来说,生或不生的抉择可能会涉及到婴儿照顾、幼儿教育、子女上学等众多与子女相关的因素<sup>[9]</sup>,显现为这一群体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sup>[10]</sup>。另有学者采用文本分析和准实验分析法,从理论和经验上论证城乡生育成本变化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sup>[11]</sup>。

#### 2. 价值导向论

长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国家生育率持续下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制度环境被认为是主要决定因素<sup>[12]</sup>。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即赡养老人、实现孝道孝行代代传承。伴随现代化进程,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必然导致家庭保障功能弱化。随之,家庭不再是承担赡养功能唯一场所。同时,流变时代快速跟进,生产方式改变与福利制度建立也使得家庭观念发生变化,人们对“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认同程度有所下降<sup>[13]</sup>。进而,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拮抗并存,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正被“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所代替,性别平等正在成为青年群体生育观念变迁的推进要素。进言之,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逐渐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及女性主义生育观普遍化等特点拉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sup>[14]</sup>。

#### 3. 文化失调论

研究认为,当下政策供给日益多元,市场经济诱致性增强,青年群体在流动社会受到多重文化影响。因之,在生存压力和阶层固化焦虑中,他们选择了让人生消沉、生命暗淡的“躺平”姿势,进而对其生育观念乃至生育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吴愈晓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生产不断式微,养老保障制度分担了子女在父母养老中承担的责任<sup>[15]</sup>。从生育角度来看,当代青年尤为注重生活质量,并据此考虑生育意愿<sup>[16]</sup>。另有学者指出,农村青年带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离开故乡,为追求自由而拒绝签署保护权利合同,也会在遇到不平等待遇时将责任归结于自己<sup>[17]</sup>,从内心层面寻找解脱方式。然而,也有学者基于代际相亲节目,研究发现年轻人在择偶和婚恋问题上更为重视自身利益以及个人欲望满足,却忽略了对等的义务和责任<sup>[18]</sup>。

### (二) 分析维度

一般而言,生育观念包括生育目的、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质量以及生育间隔等问题<sup>[19]</sup>。生育观念变迁,指青年群体在不同阶段对生育意愿、生育行动的直接表达。本研究关注两类概念:“逃着生”与“不想生”。其中,“逃着生”,即要求生多孩、生男孩,对性别有要求,有男孩偏好;“不想生”,即不想结婚或结婚后宁愿做“丁克”一族,也不想生多孩,只满足于一个子女,无性别要求。

回溯既往,生育观念在不同时期与家庭主义、个体主义具有一定相关性,并外显为特定的生育行为。

Steidel 等将家庭主义内涵界定为家庭优先性、家庭互联性、家庭互惠性和家庭荣誉感四个维度<sup>[20]</sup>；其他学者则根据家庭与社会关系归纳了家庭主义二个维度，即作为“责任”的家庭和作为“权利”的家庭<sup>[21]</sup>。其中，前者将家庭视为一种社会组织，强调家庭成员角色义务；后者将家庭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强调家庭对个人的保护和支持。后来，随着社会流变与学术推进，“个体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价值取向逐渐占据行动主位，即以尊重“个体”意志为标志，是现代性思想的基础<sup>[22]</sup>。但是，由于其缺乏对权利与义务对等认识，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面临或已经滑向自我中心主义<sup>[23]</sup>。这样，当自我为中心与家庭核心价值在人们内心相互牵绊时，“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sup>[24]</sup>”。<sup>[627]</sup>

循此言之，家庭主义和个体主义理论之争是思想层面与学术层面的抽象表达与概念碰撞。如何在实践中达致理论争鸣与现实阐发，需要将其放到现实中验证。由此，无论是生育成本、价值导向还是文化失调的理论解读，均表征为青年群体生育观念及其生育行为的一重内涵。当下农村，正处于“半陌生人社会”之中，需要对注重家庭伦理的儒家传统做出理论回应，以期调适“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的紧张关系<sup>[25]</sup>。有鉴于此，可以想见，个体主义弱、家庭主义强、性别关注度强的特定年代，“逃着生”现象成为历史的必然。到了流变时代与网络社会，人们异质性增强，人员流动加快，由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性别聚焦不断变化。农村青年在城市务工，接受市场洗礼与外来文化熏陶，注重个性表达。个体主义强、家庭主义弱、性别关注度弱等诸多现实，形塑出这一时期青年群体“不想生”观念。如是，文章从个体主义抑或家庭主义入手，展开生育观念嬗变分析，呈现其内部转化关系，是在借鉴既有研究诸多解读基础上的一种尝试。

本文作者于2023年2月开始，基于质性研究“目的性抽样”原则，历时三个多月，对皖中某县Z镇所辖村进行实地调研，采用半结构访谈收集资料，围绕“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变迁、生育行为选择”这一主题，探究其生育观念变迁元素，找到其行动的基本逻辑。其中，访谈对象为四类个案群，一是乡镇干部6人，即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及当下阶段分管或从事计生工作的干部群体；二是村级干部10人，即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及当下阶段从事村级工作的干部群体；三是老年群体15人，即上个世纪50、60年代出生，70、80年代处于婚育阶段的农村户籍老年人群；四是青年群体15人，即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生，当下正处于婚育阶段且生育意愿偏低的农村户籍青年人群，基本达致研究对象与访谈资料饱和目标。访谈资料编码按照序列编码方式，以姓名首字母代称，依次为性别、年龄、职业等人口学信息。

## 二、“逃着生”与“不想生”：两种基本社会事实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sup>[26]</sup>50-51“逃着生”与“不想生”，作为两种基本社会事实，是特定阶段人们意识观念的现实回应以及政策设计的及时反馈。其中，“逃着生”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生育政策收紧时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想生”则是新世纪政策层面将家庭与个体纳入主流现实，体现为现代婚育群体对子女数量与性别观念的日渐淡化以及基本偏好，更加崇尚个体自主性的内在涵养与外在表达。

### （一）“逃着生”形构的超生群体

超生群体源于特定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现实反馈，是农村社会实现“男孩偏好”以及“多子多福”追求而形构的特定行动。民间戏称为“超生游击队”，即在流动、躲避中完成人们对生育目标的基本实践与理想化诉求。

#### 1. “男孩偏好”形成的超生群体

乡土社会，基于生育观念延续与人员较少流动，人们思想较为保守，更看重生育对于家庭和家族的意义，而很少看重生育对于个体的基本价值。在一贯认知里，生儿育女，一方面是为了家族顺利绵延与传宗接代。生育子女越多（尤其是生育男孩越多），家族势力越大，不仅能够有效绵延子孙后代，同时也

更能在内心层面表达对祖先血脉传承的基本尊崇。另一方面是基于农耕时期基本现实的需要,生育更多子女不仅使养老资源更有保障,而且还能提升家族在村庄社会中的地位和面子,也能有效开展农业生产。在此情况下,传统社会农村青年生育意愿普遍较强,尤其“男孩偏好”。顺言之,这一群体为了实现理想化生育男孩目标,选择了长距离流动和即时性躲避等方式。本文访谈的一位老人,她家也加入了超生行列,并亲身经历了这样的“逃亡”过程。

农村谁家没有男孩,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还会在村里抬不起头。特别是当农村邻里发生矛盾、吵嘴打架等事项,没有男丁会被骂成“绝户头”。(LW,女,53岁)

另一个家庭由于生育了三个女孩,而没有生育一个男孩,便经常性被其隔壁邻居欺负。

那时候真想生育一个男孩,为此还在外躲避了几年,但最后还是没有实现。第三个女孩当时都是罚了款的。后来想想算了,就这样了。农村就这样现实,没有男孩怎么能顶立门户。

(LW,男,63岁)

上述种种,形构出特定时期农村家庭外出躲避计划生育政策,而最终实现生育男孩的“超生群体”。

在这里,家庭凸显其社会细胞基本功能,个体作为家庭、家族一分子,必然会在家庭主义框架下牺牲个人基本追求。质言之,“在传统关系模式中,个人是为了延续其(或其丈夫的)家庭而存在,不是为了服务个体的需要而创造家庭”<sup>[27]22</sup>。尤其在生育政策收紧阶段,中国传统家庭的价值取向十分强调父子关系,讲求男性继承制,认为只有生育儿子才能延续家族香火。进而,生育决策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本位,传宗接代、延续门楣是个人价值的最高体现。而这一点,也能从当时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乡镇分管领导那里得到验证。

那时候镇里,计划生育是头等大事。“一票否决”,上下都很重视。到外地抓超生是经常情况,北到内蒙古,南到广州、深圳,东到江浙沪,西到四川、湖北等地,全国各地都跑遍了。

(LHW,男,50岁,乡镇分管领导)

## 2. “多子多福”形成的超生群体

中国传统价值观里,“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体现了人们对世代传承与家族观念的重视。钱穆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sup>[28]51</sup>人是社会中的人,是家庭、家族一分子,人与社会相互嵌构,实存的个人绝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脉络尤其是家庭关系。张祥龙认为,“儒家的全部学说之根扎在家里边”。因而,“在儒家看来,人的终极存在不在个体而在原初和真切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家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之中”<sup>[29]18-19</sup>。由此,家、家族及其伦理既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也体现中国文化的根本内涵与血脉渊源。其对个人价值形成与行动思维、行动方式等均有较强的连带作用。一位工作多年的村干部感受颇深,说出了其在计划生育年代开展农村基层工作的艰难,反向验证农村社会超生行动的实体再现。

当村干部这么多年,农村什么情况都了解。农村就是那样子,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帮腔。

你家里有几个弟兄,在村里声势就不一样,就能占点便宜。(YWH,男,56岁,村党支部书记)

反观村民群体基本认知,农村社会封闭狭小,关系网络清晰,谁家情况基本都能了解。“人多力量大”“拳头多了不吃亏”等固有观念,更是强化了传统时期农村青年对于生育子女数量的另类追求。

你家里有几个男孩,不仅在村里有地位,没有人敢招惹你家,就是在家门里也是一种资源。

(KY,男,58岁)

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中国,人们仍然固守“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基本信念<sup>[30]</sup>。加之,传统农耕手段和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导致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这就形成了劳动力多,尤其是男劳动力多在农业生产中的显在优势。另外,在这些地区,农民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有生育观仍有强大而顽固的生命力。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当地青年农民的生育心理,即多生育、生男孩,并从行动模式上表达为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消极应对与积极躲避,实现自己及其家庭生育理想子女数的超生行为。

## (二) 亚文化形构的“不想生”群体

相较而言,亚文化是游离于主文化之外的边际性文化。在传统社会,处于婚育年龄段的青年男女结婚、生子被视为人生道路上的必经过程,是父辈必须帮助子代完成的家庭责任。在这种观念引导下,结婚、生育并不被看作是个人的隐私和自我选择,而是家庭与家族的基本要求。因此,那一时期,农村地区主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青年男女数量极少。反之,进入新世纪,随着亚文化侵入以及现实社会压力,多数农村青年选择晚婚晚育,甚至极少数青年选择不婚不育,直接形塑出一批“不想生”的亚文化群体。

### 1. “个体至上”形成的“不想生”群体

亚文化症候中的青年群体,无论“80后”“90后”还是“00后”,沉浸在自我世界里不断舒展。到了婚育年龄,不结婚、不生育,有的宁愿做起“丁克”,呈现出低欲望“躺平”主义。农村青年在流动时代的现象性表达,成长为“候鸟”式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面对城市生活诱致性以及现实性压力,正在经历“城市融不进、农村回不去”的尴尬境遇,从而形成对于结婚生育的恐慌与排斥。一是迎合“佛系一代”的“向死而生”,二是内卷式的精致性自我追寻。有数据表明,80.2%的被调查者不认同“养儿防老”观念<sup>[31]</sup>,且将“养儿防老”的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强调情感满足的个体主义生育动机。这一群体在城市打工,追求个体自我的暂时性满足,不仅不结婚,而且连谈恋爱都是一件暂时无法完成的任务。

现在在外面打工,整天忙死了,哪有时间谈恋爱、结婚,更别提生儿育女了。我们这代人和父辈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他们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我们有自己的生活!(LSY,女,29岁)

我现在还小,还不到三十岁呢!我就根本没有想过要结婚,一个人多自在呀!(ZSD,男,28岁)

诸如此类的言语,成为他们寻找个体自由、摆脱当下传统束缚的一种借口。调研可知,强调个体存在感,追求自我价值,以自我为中心,是这一时期青年群体的亚文化表达。他们在务工城市甘做“负翁”“月光族”等,不敢也不愿承受结婚生子带来的家庭责任与照护义务。作为“飘着的一代”,想在城市立足,实现市民化目标,但是现实层面的诸多约制又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即。面对城市高强度生活压力与工作节奏,这一群打工工人不甘心沉沦,自动选择内卷式生活;或者卷不动,而宁愿选择暂时性“躺平”。

现在这么卷,你不努力,就会被淘汰。但是我又不甘心躺平,回老家做个啃老族。所以在城里暂时飘着,混一天是一天!(YS,男,26岁)

### 2. “压力负荷”形成的“不想生”现象

凡勃伦指出,财富能够保证有闲阶级即使不劳动,也能做到“有闲”<sup>[32]77-82</sup>。当下,社会流变性与需求多元性,农村青年在城市化过程中感受城市生活诱惑,并在现实层面达致悠闲生活的当下实践。他们不愿背负太多城市压力,如经济压力,子女生育、养育压力,升学、就业压力以及自己的晋升压力,等等。如此之多重压力相互糅合,形构结婚生育以及生育多孩等行动意愿的消极与后撤。他们的记账本里,可以清晰看见其理性分析生育后的诸多开销,从而让生育政策回归家庭与个体后的自动区隔与消极应对。

一个小孩,从怀孕、出生,接下来幼儿园、兴趣班,小学、初中、高中,上大学了,一直到结婚,都要花钱。一个孩子尚且如此,别讲二孩、三孩了。农村收成有限,城里打工也挣不到多少钱。我现在有一个男孩,比较满意的。所以,暂时是不会考虑生育二孩的。(LRW,男,32岁)

有研究指出,抚养孩子经济成本可分为三个方面,即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其中,生育成本方面,普通公立医院生育一个孩子,孕检、产检及分娩全过程费用一般为5 000~20 000元。教育成本方面,我国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10 374元/年,高中、初中、小学生均教育成本分别为17 883元/年、9 982元/年、7 532元/年<sup>[33]</sup>。延展来看,城市家庭对子女教育模式因应到农村家庭中,在经历“一孩”教育“内卷”和“鸡娃式”生活之后,很多农村青年对生育“二孩”和“三孩”望而却步。孩子成年后结婚彩礼、婚房配置等,也是他们不想生育多孩的现实约制。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仅为2 063元/平方米,2019年则高达9 310元/平方米<sup>[34]</sup>。从这一点看,当今高房价和养育后代高成本,不仅直接导致低收入群体难以实现有闲阶级生活目标,也导致部分原本在低房价和低养育成本条件下能够实现自然悠

闲目标的中等收入群体生活变得较为艰难,同样加大了他们“成家立业”以及生育“二孩”以上目标的难度系数。

在村里搞计划生育好多年了,从那时候“一孩半”政策严格性来看,好多家为了生个男孩……弄得家里一贫如洗的。现在政策放开了,都在讲卫生、计生保健了,注重女性生育品质了,年轻人反而不生了。有的到了年龄,不谈恋爱、不结婚,更别提多生几个小孩了。(TYK,女,50岁,村妇女主任)

综上,农村青年裹挟在务工大军中,一方面感受城市文明的激情四射,另一方面感受城市生活的亚文化侵扰。现实语境下,生活成本高企,工作压力大,社会竞争内卷严重。因而,这一群体认知里,现代社会,多一个孩子不只是过去“多添一双筷子、多煮一把米、多舀一瓢水”等散养模式,而需要全身心、全过程投入精力看护,投入经济支撑,更要考虑子女在竞争社会中诸多不可知的未来。诸种现实,对农村青年来说,在既要抚育下一代,又要赡养上一代的重担之下,正逐渐向“生得起、养不起”“生容易、养太累”的现实屈服,逐渐淡化生育“二孩”或“三孩”念头,并据此形构农村青年对生育行为的消极回应与尘世逃离,成为“不想生”群体中的一员。

### 三、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嬗变的二维张力

当前,多数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使得农业从业人口大量减少。同时,劳动方式改变致使生产者不得不通过减少生育子女数量来获得更多学习、工作时间。另外,现代生产力提高和卫生条件改善大大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使得家庭从追求子女数量逐渐转变为注重子女素质<sup>[35]7-8</sup>。据此,从前“逃着生”演变为当下“不想生”现象,均具有存在的基础性要件。进而,无论是家庭主义传统观念还是个体主义现代性追寻,都较为清晰地阐释了农村青年生育观念的嬗变逻辑。

#### (一) 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张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主义则是价值体系在家庭中的社会实践,且具体表征为生育观念中被社会强化的性别关注度,“男孩偏好”“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成为家庭主义语境下的日常操守。相对而言,个体主义认为每一家庭成员都是一个利益主体,个人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与能力<sup>[36]</sup>,个体价值高于群体价值,并具体显现为日渐弱化的性别关注度,“男女平等”“活在当下”成为个体层面的行动遵循。因此,社会体系中,伴随家庭主义式微以及个体主义崛起,从家庭主义过渡到个体主义,是现代社会对于人们观念行为的一种导引与启蒙,并能有效形构人们的生活实践与行动样态。

##### 1. 家庭主义式微

通常而言,生活认知层面的家庭主义可表达为传统家庭主义再现(本文所称家庭主义即传统家庭主义)。其核心观点有两个,一是家庭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二是家庭成员有强烈责任感。现代社会,随着个人在家庭(族)中地位和话语权大幅提升,“家核心”“家本位”“家天下”传统生育观在现代化进程中已呈弱化趋势。现代青年的人生信条中,绵延子嗣不再居于首位。他们会因职业发展、理想追求、享受自由生活等各种原因推迟生育计划,甚至少生或不生。同时,分析看到,“家庭关系中个体转而成为中心的趋势”<sup>[37]11</sup>,注重自我而较少关注外在看法,成为其思维走向与行为方式。这一群体的个人意识不再湮灭于家族意识之中,不再将个体利益捆绑于家族或家庭利益之中。

现在年轻人基本没有家庭观念,也没有家族传承意识。对于传统风俗等也看得比较淡,不注重乡情民俗,不注重传统礼节性交往。他们更注重短平快,注重网络效应,赶时髦、求新鲜。(TYF,男,52岁)

另有部分农村老人更是自嘲地说自己知道的网络热词,并据此谈到自己对于当下农村青年的认知,以及家庭观念淡漠的无奈。

网络上热词“断亲”,说的就是年轻人现状。男孩大了,不谈对象、不结婚、不走亲戚。整

天待在家里,上网打游戏。对人情世故等不管不问,还怎么指望他们今后顶门户。(HJN,女,42岁)

村里好多女孩出去打工几年,钱没有挣多少,观念却转变得快。张口闭口都是网络流行语,我们也不懂。对于传统节日敷衍了事,倒是比较注重过“洋节”!(JND,男,55岁)

对于过往时期农村青年“逃着生”等基本事实,学者们从农民生育动机、生育需求等方面进行解释,将农民超生原因归结于中国传统生育观念和文化影响,其中又以强烈的“男性偏好”“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接续香火”等观念影响最大。然而,伴随流变社会的独特性,以及网络社会即时性表达,让这一群年轻人内心深处,不仅家庭(族)主义生育动机不断淡化,而且男性偏好也日益弱化。“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基本观念正被未来可见的自我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代替,从而呈现出青年一代对于家庭主义基本遵从逐渐弱化甚至式微后,具象化为“不想生”的基本事实。

## 2. 个体主义崛起

伴随现代化进程,个体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转型<sup>[38]</sup>,其相互依存、相互嵌套的基本事实正被强调个体意识所掩盖。在中国社会,个体主义是20世纪初从西方传进的舶来品。且在传进来后,其内涵也伴随转型期基本现实而发生了变化。有学者曾指出,个体化理论有三个面向值得特别关注<sup>[37]</sup>,并最终在去除传统化之后,实现个体化目标。从这点来看,个体化基本面向本身含有矛盾复杂性与需求多元性。流变社会中,青年群体不再固守农村场域,而呈现为高强度、大范围流变与脱离。尤其在务工城市,年轻人或主动或被动接受个体主义以及社会亚文化悄然润饰,引发其对现实社会压力的及时反馈与自我表达。

生儿育女,不仅有生的责任,更有养、育的义务。但对打工族来说,养育一个孩子,还能凑合,养育两个以上就比较艰难了。这不仅是温饱问题,而且是更高品质教育与后续发展的问题。(WHJ,男,30岁)

进而,伴随个体主义崛起,青年群体生育意愿更迭与行动模式,需从更全面视角对生育意愿代际传递路径和作用机制加以认识<sup>[39]</sup>。农村青年处于流动大潮中逐渐迷失自我,而被自利、个人、内卷、躺平、摆烂等概念性语境所塑造。于是,凡事从自我利益出发,考量自我感受,追求个体基本价值以及现代性主动适应,而很少在乎外在基本看法与传统风俗羁绊。上述种种,均表征为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的嬗变诱因。

在城里打工,看似每月拿到手不少工资,但是架不住花费大呀!吃饭、买衣服、化妆品、旅游等哪样不花钱。你不能像我们父母亲那样,劳累一辈子就是为了能够吃饱饭,然后活下去。年轻人还是要讲究生活品位的。(WT,女,35岁)

马克思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sup>[40]</sup><sup>[527]</sup> 务工城市快节奏以及市场经济精于算计等行动思维,贯穿于农村青年日常实践中,从而导出家庭主义逐渐式微与个体主义强势崛起。两者形成鲜明反差,并在何为主体与本位中相互拉扯,形构出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变迁的显在张力。

## (二) 家庭主义与新家庭主义抵牾

通常来说,家庭主义以家庭伦理为核心,并在家庭伦理规制下对家庭结构、家庭资源和家庭关系进行调整与优化后,具象化为子孙绵延与代际传承。然而,现代性过速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转变,激活了农民家庭主体性和能动性,塑造出“新家庭主义”<sup>[41]</sup> 伦理规则。这样,与传统家庭主义有所不同,“新家庭主义”更加强调家庭功能性与调适性,并以“子女为中心”以及“恩往下流”行动路向与人伦关系为表达方式。

### 1. 家庭主义基本转向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sup>[42]</sup><sup>[6]</sup> 传统时期,“家庭主义”被界定为人伦规则,注重“伦”的效应,强调家族与家庭整体利益。现代

社会里,伴随家庭主义基本转向以及流动性多重拉扯,整体氛围倾向于多元和包容,其家庭主义基本构成也相应变更。尤其社会层面对子女性别观念逐渐弱化,如不再强调子女数量,不再强调“男孩偏好”等基本观念渐入人心。加之,流动性变迁与快节奏生活,引致社会注意力大多聚焦即时性动态,而很少长时间聚焦某一领域,也引发人们生育观念及其生育行动基本转向。换言之,一是数量上,追求由多变少,从“多子多福”转为“少生优生”“优生优育”;二是性别上,由“重男轻女”逐步转变为“一男一女”直至“生男生女都一样”,对生育男孩追求程度降低。既往“多个孩子加瓢水、加把米”的艰苦生活正逐渐被高品质现代性生活所代替,直接导致青年群体淡化外在期待,注重个体价值与生活、精神层面理想化追求。

现代社会,竞争这么激烈,都在讲内卷。生育太多孩子,素质提升就跟不上了。我家一个女孩,感觉挺好的,没有觉得一定要有个男孩。现在追求精细与精致培养。(QRH,男,29岁)

与之相应,这一群体行动思维,表现在子女身上,与老一代散漫化抚养根本不同。日常实践里,农村子女也要享受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公共服务资源观念,让其在现实中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严重内卷行列。未来期许里,不仅考量孩子现在的生活品质,而且还要在可预见的未来,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平台。同时,在赡养父母方面,“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可能只是某些人群内心认知的理想化表达,现实层面却出现较多“女儿赡养老人比儿子更好”“女儿可能比儿子更为贴心”的现象。

男孩有什么好的,隔壁老李家倒是有三个儿子。老李走掉后,留下老太婆由三家按月轮流赡养。老太婆每个月到处颠簸,到哪家都不习惯。最终不到两年,也走掉了。还是像我们家这样一个好,不要操心这事!老张家倒是两女户,现在比谁都过得好。丫头们抢着孝顺!(JQ,女,48岁)

如此种种,均有效消解了家庭主义“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生育子女性别、孩次上的追求。

## 2. 走向新家庭主义

新家庭主义是相对(传统)家庭主义而言的。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家庭利益均高于个体利益。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家庭主义强调“利往上走”,强调绵延子孙,接续家族香火;新家庭主义则强调“恩往下流”,强调精致性养育,整合全家力量优生优育。进言之,与家庭主义相应,儒家传统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观念也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负有强烈义务;而新家庭主义则在于子代发展以因应社会调适性,呈现为“以子女为中心”与“恩往下流”的基本格局。受这种“下行式”家庭观念影响,中国父母不但将子女养大成人,而且还帮助子女结婚成家。且等子女有了自己后代,还要帮助子女照顾孩子。据此推之,家庭义务束缚下的中国父母承担着无限责任,呈现出新家庭主义基本特征。

在城里打工,一年收入也有十来万。但一直是租房居住,一个男孩,带在身边上学。你说像这样的条件,如果不考虑购房因素,也能集中精力把他培养起来。比如参加兴趣班、辅导班等等,暂时都能搞得起。家中长辈想让我们再生一个,说以后可以让孩子有个伴。但我们认为,一个孩子,好好培养就行了。如果再多一、两个,生活质量就不一样了。(WY,女,38岁)

由此,在现代化和市场化面前,农民家庭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被改造的客体,而是呈现出很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欲通过代际合作积极回应现代性压力。无论生育还是养育,农村青年在城里务工,感知城市生活节奏,其对子代期望值正在成为新家庭主义航标。在这里,对他们来说,子代教育不再是可选项目,而是必选项目。教育在促进家庭发展中的地位正在上升,兴趣班、补习班、专人接送等,正成为农村青年对子代的标准配置。

儿子、媳妇在外打工都比较忙,我们老两口帮助他们,接送孩子上下学,让他们安心打工。

老两口现在还能干,但是挣再多钱,孩子培养不出来,不还是没有用吗?(WG,女,52岁)

在此意义上,当子女培养成本与质量呈正相关时,农村青年生育观念中“少生或不生”是常态。“多生一个、让孩子有个伴”则更可能是长辈对子辈的理想化期许,是长辈基于传统观念的当下呼应。这一社会背景下,新家庭主义融入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也是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权宜性举措,更是形构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变迁的另一张力。

综上,乡土社会里,外在因素对子女性别关注度高的阶段,家庭主义占主流,农村青年普遍表现为积极的生育意愿,并在“逃着生”中实现“男孩偏好”以及“多子多福”的关照;流变社会里,外在因素对子女性别关注度低,甚至发生关注转向阶段,个体主义逐渐占据优势,农村青年普遍表现为消极生育意愿,并在“不想生”中展示其亚文化心态。如此种种,便可勾勒出社会变迁与文化流变效应生发的生育观念嬗变逻辑,即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张力以及家庭主义与新家庭主义抵牾后的代际延展与行动再现。

#### 四、结论与建议

生育观念变迁,是青年群体基于现实社会压力的自觉反馈,其间不仅具有家庭责任重构,也有个体愿望表达,更是对于国家层面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接续调整后的及时回应。基于此,文章以Z镇案例为依托,采用半结构访谈收集资料,探究农村青年生育观念的嬗变逻辑。具言之,一是事实经验层面,“逃着生”现象是特定时期“男孩偏好”以及“多子多福”观念的直接体现;“不想生”现象是流动时代个体至上理念以及现实压力难以承受后的理性选择。二是理论解释层面,围绕生育观念和行动逻辑,文章用个体主义、家庭主义双重张力这一架构予以阐述。一重因素是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张力而引致的变迁,另一重因素则是家庭主义与新家庭主义抵牾后的基本流变。两重因素相互嵌套,共同形塑出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嬗变的基本历程。毋庸讳言,作为一项质性研究,上述论证只是基于特定时代以及具体场景而提供的一种解释维度和研究方位,尚存在资料不够全面、解释不够多维、研究深度有待拓展等不足,后续将予以跟进。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sup>[43]54</sup> 青年群体在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既要处理好个体与家庭关系,也要处理好个体与社会关系,更要处理好当前与未来关系。如是,上文基于个体主义、家庭主义等行动要素所呈现的生育观念变迁逻辑,还需将应对之策融进生育政策顶层设计、基层实践以及青年群体文化认同中,共同构成推动生育观念转变和生育行为优化的三维框架。

第一,强化生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奖补制度体系。当前,尽管国家层面已相继推出“全面二孩”“开放三孩”等系列宏观政策,以期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但在基层实践层面,仍暴露出政策执行力度不足、目标定位不准确等问题,亟待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相应奖补体系。具体而言,一是尽快制定详尽的政策实施细则,确保政策在地方层面贯彻执行;二是构建高效的政策实施组织体系,整合教育资源、医疗保健、住房保障等多方面资源,形成生育政策支持合力;三是建立动态监测和评估体系,定期评估生育政策实施效果,以便及时制定针对二孩、三孩家庭的具体奖补措施。

第二,精准对接个体需求,推动基层实践有效落地。对于如何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满足个体需求,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基层有效对接,推动政策有效落地。譬如,研究制定二孩、三孩家庭在生育、托幼、上学、购房等方面的奖补办法,以具体可操作举措纾解育龄人群内心无形焦虑与外在有形负担;基层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提供育儿津贴、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市场主体要主动参与,提供灵活的工作制度、育儿假等;社会组织应积极为育龄家庭、育龄人群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社区应着力营造温馨的生育氛围,打造社区支持网络;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要增强理解和支持,共同承担生育、养育责任等。

第三,基于文化认同,拓宽青年群体生育思维。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对青年群体生育意识进行引导和拓展。一是通过多样性文化活动,传递生育积极信息,减少青年对生育的负面认知。帮助青年群体正确认识自我,有效处理个体主义与家庭关怀、社会认同之间的复杂矛盾;二是通过文化教育与生命教育,强化青年群体对家庭价值和社会责任的认知,帮助他们有效平衡工作、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创新宣传方式,利用新媒体等渠道,传播生育观念正能量,减少青年对生育、养育子女的顾虑,共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 [参 考 文 献]

- [1] 央广网. 国家统计局:2022 年中国出生人口 956 万人 出生率为 6.77‰[EB/OL]. [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30228/t20230228\\_526166885.shtml](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30228/t20230228_526166885.shtml).
- [2] 新华网. 总和生育率低至 1.3,我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EB/OL]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5/17/c\\_1127456086.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1-05/17/c_1127456086.htm).
- [3] 张越,陈丹. 新中国 70 年的人口政策变迁与当代人口发展[J]. 宏观经济管理,2020(05):62-69.
- [4] 张翼.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人口变迁及未来政策改革[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04):18-30+2.
- [5] 邢朝国. “既想生”又“不想生”:对未育青年生育矛盾心态的探索性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20(07):54-61.
- [6] 贝克尔. 家庭论[M]. 王献生,王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7] 李建民. 中国的生育革命[J]. 人口研究,2009(01):1-9.
- [8] 郑真真,李玉柱,廖少宏.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2009(02):93-102+112.
- [9] 风笑天. “单独二胎”: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05):57-62.
- [10] 李永萍.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 Y 村的田野调研[J]. 中国青年研究,2023(02):59-68.
- [11] 靳卫东,宫杰婧,毛中根. “二胎”生育政策“遇冷”:理论分析及经验证据[J]. 财贸经济,2018(04):130-145.
- [12] 徐映梅,瞿凌云. 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鄂州、黄石、仙桃市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2011(02):76-84+112.
- [13] 於嘉,谢宇.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J]. 人口研究,2019(05):3-16.
- [14] 田宏杰,孙宏艳,赵霞,张旭东. 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J]. 青年探索,2022(04):77-86.
- [15] 吴愈晓,王金水,王旭洋. 中国性别角色观念变迁(1990—2018):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及性别差异模式[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04):76-90.
- [16] 熊春文,陈家碧. 青年农民研究:背景、议题与展望[J]. 青年研究,2021(01):1-14+94.
- [17] 段然. “积极个人”:个体化视角下都市青年的职业选择及其另类实践[J]. 中国青年研究,2021(09):63-70+55.
- [18] 章宏,邵凌玮. 个体化视角下中国当代青年对代际相亲节目的接受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20(03):88-95+159.
- [19] 马培津,潘振飞. 皖北农村青年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学分析:以马村的个案研究为例[J]. 青年研究,2005(07):21-26.
- [20] Steidel, A G L. A new familism scale for use with Latino populations[J].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2003, 25(3):312-330.
- [21] 康岚. 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J]. 青年研究,2012(03):21-29+94.
- [22] 孙向晨. 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再反思[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62-69.
- [23] 阎云祥.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 龚小夏,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24]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M]. 董果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25] 陈晨捷. 论“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兼容之可能进路:以先秦儒家“报”伦理为视角[J]. 文史哲,2021(06):22-31+161-162.
-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7] 贺美德,鲁纳. 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M]. 许烨芳,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28]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29] 张祥龙. 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30] 石智雷. 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J]. 社会学研究,2015(05):189-215+246.
- [31] 何兴邦,王学义,周葵. 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 CGSS(2013)的经验证据[J]. 西北人口,2017(02):31-38+53.
- [32]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M]. 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33] 刘娜,李小瑛,颜璐. 中国家庭育儿成本:基于等价尺度福利比较的测度[J]. 人口与经济,2021(01):50-67.
- [34] 张樨樨. 房价泡沫抑制了生育率复苏吗:论生育率与房价的动态因果关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2):164-175+180.
- [35] 郭沧萍,等著. 老年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36] 李桂梅. 现代家庭伦理精神建构的思考: 兼论自由与责任[J]. 道德与文明, 2004(02): 58-62.
- [37] 阎云翔.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 陆洋,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38]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39] 卿石松. 生育意愿的代际传递: 父母观念和行为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05): 48-63+127.
-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1] Yan Yunxiang. Familial affections vis-à-vis filial piety: the ethical challenges facing eldercare under neo-fami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J].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Volume10, Issue1. 2023.
-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The Evolution Logic of Fertility Concept of Rural You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Fertility Rate

Chen Ji   Zhou 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method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fertility concept of rural youth and its action logic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fertility rate, focusing on the phenomenon of “Escape” when the birth policy is tightened, which is a direct classific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Don’t want to have a child” when the birth policy is returned to the family and individual, thus presents the birth concept in the action level of direct outreach. Through deep excavation of its evolution and its deductive logic, it appears as the tension between family and individualism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family and new family. In other words, when the family doctrine is dominant and the social attention to gender is high, it is the basic pattern of “Escape”. When the individualism is dominant and the social attention to gender is low, is the “Do not want to live” basic form. It can be seen from this that the essential factor of the change of the fertility concept of the rural youth lies in the inherent uniqueness of the youth group, which exis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amily doctrine to the individualism and from the family doctrine to the new family doctrine, and further expressed for its changing society and external culture of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appearance.

**Keywords:** low fertility rate; individualism; new family; fertility desire; rural youth

[责任编辑: 陈忻]